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73集“学界展望”

学界展望（哲学）

[日] 渡边义浩 长谷川隆一 富田绘美 关俊史
原信太郎アレシヤンドレ 高山大毅 撰
颜淑兰 译

如上期所告知，此次“哲学”“文学”部分以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两年份为叙述对象，“语言学”部分则以2020年1月至12月的一年份为对象。

一 总论

在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两年间在日本国内公开刊行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中，“学界展望（哲学）”以著作为中心进行展望。研究领域的分类和负责人按照各部分顺序分别为：总论（渡边义浩）、先秦两汉（长谷川隆一）、魏晋南北朝（富田绘美）、隋唐（关俊史）、宋元明清（原信太郎アレシヤンドレ）、日本汉学（高山大毅）。

与以往不同，这次之所以汇总了两年份，是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所致。渡边在疫情之下与学生们一同研读古典。其成果之一，就是渡边义浩、高桥康浩、伊藤凉、泷口雅依子编《全译论语集解》上下卷（汲古书院，2020）。遵循《论语》注释中最恰当者，又或者发明自己新的解释，以此逼近《论语》的真味或许是王道。但与此同时，梳理一位与时俱进的注释者其思想体系中《论语》的定位，作为哲学的方法论也具有重要意义。《论语集解》虽不是何晏一人之作，但从被公认是何晏所作的无记名的注释中，提炼出何晏的思想是可能的。朱熹方面，已经有土田健次郎译注《论语集

注》（平凡社东洋文库，2013～2015）出版，如此，《论语》古注和新注的代表作都能读到现代日语版了。

这两年里，用现代语翻译经书注释的最大成果，是野间文史《春秋左传正义译注》第一至六册（明德出版社，2017～2019）。《春秋左氏传》正义不仅在经学，在史学上也极为重要，我们能够借助野间端庄的日译读到它，意义重大。此外，经书方面，已著有《毛诗正义研究》（白帝社，2003）的田中和夫正在推进《毛诗正义》的译注，出版了《毛诗注疏译注小雅（三）》（白帝社，2019），其中翻译的系列诗歌歌颂了中兴西周的宣王。山口谣司《书经》（KADOKAWA，2019）是一本《书经》的入门书。宇野精一《孟子全译注》（讲谈社，2019）也再版了。滨久雄《读易——伊藤东涯〈周易经翼通解〉全译》（明德出版社，2020）是对继承了仁斋的《易经》见解的东涯《周易经翼通解》的全译。汤浅邦弘编《儒教名句——解读〈四书句辨〉》（汲古书院，2020）是对《四书句辨》的全译，《四书句辨》是由中井竹山摘录江户刊行的《四书》附录而成。

此外，池田知久《老子全译注》（讲谈社，2019）在日语训读和现代日语译文的基础上附以解说，随处体现出池田以出土资料为中心展开的《老子》研究成果。池田知久此前已著有《庄子全译注》（讲谈社，2014），能读到池田对老庄思想基础书的现代日语解释，意义重大。此外，谣口明《从弟子的视角解读〈论语〉》（朝仓书店，2019）是从弟子的视角读汉文《论语》的入门书。池田秀三《说苑》（讲谈社，2019）是对1991年出版的《说苑——智慧的花园》（讲谈社）一书的修订，开头附有长达50页的解说，阐明了刘向的写作意图。虽然此前已有守屋美都雄的《荆楚岁时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78）译文，中村裕一《译注荆楚岁时记》（汲古书院，2020）能够让我们了解梁代长江中游流域的岁时习俗，很有意思。

为了壮大日本中国学的根基，除了典籍的日语翻译，概论性书籍的出版也很重要。以新发现的曹操高陵遗物为中心，东京国立博物馆于2019年7月至9月、九州国立博物馆于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举办了“日中文化交流协定缔结40周年纪念特展《三国志》”。渡边义浩出版了《人事的三国志——变革时期的人脉、人才录用、立身出世》（朝日新闻社，2019）、《集中讲义三国志：正史的英雄们》（NHK出版，2019）、《初读三国志——以时代的变革者曹操为视角》（筑摩书房，2019），并和仙石知子共同编写了《三国志演义事典》（大修馆书店，2019）、《全译〈三国志·蜀书〉》

(汲古书院, 2019), 此外, 渡边义浩还出版了《始皇帝——中华统一的思想》(集英社, 2019)、《汉帝国——400年的兴亡》(中央公论新社, 2019)。

另外, 伊藤邦武、山内志朗、中岛隆博、纳富信留编《世界哲学史》全八卷(筑摩书房, 2020)历时地梳理世界哲学传统和活动, 探索将来的理想形式, 是一次正合时宜的企划。第一至四卷和第八卷分别收录中岛隆博《中国诸子百家的世界和灵魂》、渡边义浩《古典中国的成立》、志野好伸《佛教·道教·儒教》、垣内景子《朱子学》、王前《中国的当代哲学》, 第五卷收录中岛隆博《明代的中国哲学》和蓝弘岳《朱子学与反朱子学》, 第六卷收录石井刚《中国的感情哲学》和高山大毅《江户时代“情”的思想》。

除此以外, 串田久治编《天地变异如何被叙述——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东方书店, 2020)论述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如何理解天地变异, 以及不同地域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方法有何不同。石井公成《东亚佛教史》(岩波书店, 2019)是一本通史, 描绘公元前后流传至东亚的佛教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论述所及不仅译经, 还包括汉字文化圈独创的经典。小川隆《中国禅宗史》(筑摩书房, 2020)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哲学, 讲解禅僧话语的解读手法。船山彻《生为菩萨》(实践佛教系列I, 临川书店, 2020)论述与大乘佛教之根本密不可分的菩萨的生存方式。村田濂、石井公成《信教、乐教》(实践佛教系列IV, 临川书店, 2020)从“写经与佛画”“佛教的娱乐”两个观点论述佛教的文化广度。姜生著、三浦国雄与田访翻译《汉帝国的遗产——道教的勃兴》(东方学术翻译丛书, 东方书店, 2020)运用汉墓出土的画像资料, 尝试重构死者的成仙过程, 探究汉代人的信仰心和宗教观, 将其定义为初期道教。陶德民《西教东渐与中日情形——拜礼·尊严·信念的文化交涉》(关西大学出版部, 2019)通过数位人物的关系描绘出从清朝的典礼问题到明治末年的三教会同这一东西宗教交流的历史。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与德安博(Paul J. D'Ambrosio)编著, 鬼泽忍译《桑德尔教授, 遇见中国哲学》(早川书房, 2019)体现了正义论的新进展。深泽贤治《阳明学之劝VII》(明德出版社, 2019)描绘出佐藤一斋的人物形象。佐藤弘夫、平山洋编著《概说日本思想史》(Minerva书房, 2020)是前著的增补版, 新加入了平成思想史的内容。

牧角悦子、町泉寿郎编《汉学的视角》(“讲座: 近代日本与汉学”第1卷, 戎光祥出版, 2019)定义江户时代后半明确显形的“汉学”, 从日本

文学和汉学视角论述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特性。江藤茂博、町泉寿郎编《汉学与汉学塾》（“讲座：近代日本与汉学”第2卷，戎光祥出版，2020）透过“私塾”呈现“汉学”的广度及其连续和不连续性。町泉寿郎编《汉学与医学》（“讲座：近代日本与汉学”第3卷，戎光祥出版，2020）解析汉方医学向西医转型时期汉兰折中医学^①的实况。江藤茂博编《汉学与东亚》（“讲座：近代日本与汉学”第8卷，戎光祥出版，2020）将“东亚”作为关键词，呈现了研究的多角度性和今后的可能性。与这些研究相反，津田左右吉否定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渡边义浩、黑崎惠辅、关俊史、泷口雅依子编《津田左右吉译稿集：托马斯·卡莱尔〈伟人崇拜论〉》（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2019）将津田未公开的翻译稿进行整理并出版。

此外，还有基于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出版。名和敏光编《东亚思想、文化的基层结构——术数和〈天地瑞祥志〉》（汲古书院，2019）以仅存于日本的《天地瑞祥志》为中心，同时收录包括术数学在内的论文和《天地瑞祥志》的翻印和校注。渡边义浩编《跨学科的中国学》（汲古书院，2019）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东方学会共同举办的第十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的论文集。

还有根据主题结集的论文集。水上雅晴编、高田宗平协编《年号与东亚——改元的思想与文化》（八木书店古书出版部，2019）解析汉字文化圈中年号的具体情况以及执政者的意图等。三国志学会编《三国志论集：狩野直禎先生追悼》（汲古书院，2019）为追悼三国志学会的首任会长狩野直禎，收录了14篇关于三国时期思想、文学、历史的论文。

跨越多个时代的研究，有堀池信夫《老子注释史研究——樱邑文稿1》（明治书院，2019）。该书围绕《老子》从魏晋到明清的主要注释，揭示每个时代注释的变化。同时，考量各注释者的思想背景，例如，关于曹魏王弼和唐玄宗注，分别以“道”和“无”、“道”和“妙本”这样一些形而上的概念为中心展开分析，关于想尔注和顾欢、王玄览等的注释，则从宗教角度切入。据此，凭借渊博的学识对复杂多样的《老子》注释形态展开敏锐的分析并取得成功。吉田笃志《中国古代思想考察》（明德出版社，2019）涉及对五帝神话与历史夹缝的探究，对《诗经》《尚书》的分析，以及对以亲亲和尊尊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和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考察。此外，

^① 指折中吸取汉方和荷兰医学长处的医学。——译者注

还有围绕各地历史遗迹、博物馆、研究所的见闻录,可见作者关注点之广,行动力之强。浅野裕一《消失的辙——古代中国的面影》(朋友书店,2020)揭示殷商出现的作为人格神的上帝与周朝用于巩固统治的普遍的上天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认为在以远离鬼神、依靠上天信仰的统治论为方针的思潮中,诸子时代中国哲学拉开了序幕。进而,探究《老子》的作者形象,提出《左传》成书情况的假说,叙述《国语》的写作意图,运用新出土资料重新定位《易》和《中庸》。之后,分析告子、《荀子》和《楚辞》,论述《吕氏春秋》和天人感应论的关系。

除此之外,黄进兴著、中纯夫译《孔庙和儒教——学术与信仰》(《黄进兴著作选集》1,东方书店,2020)分析孔子后裔所进行的孔子祭祀被纳入国家祭祀系统的过程以及儒家道统价值标准的变迁。黄进兴著、工藤卓司译《孔庙和帝国——国家权力与宗教》(《黄进兴著作选集》2,东方书店,2020)进一步阐明儒教作为国家宗教的本质,将孔庙视作政治与宗教交融的重要场域,根据孔庙从祀制度的变迁追溯中国思想史的展开。片冈龙《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朝鲜、日本、琉球“朱子学”迁移百态》(春风社,2020)从养生医学、公共、生命、自然等视角论述围绕朱子学的文明现象在朝鲜、琉球、日本的变迁。二阶堂善弘《东南亚的华人庙和文化交涉》(关西大学出版部,2020)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中心,调查东南亚华人的民间信仰和道教,报告越南、泰国、菲律宾的道教信仰和庙的现状。汤浅邦弘编著《中国思想基本用语集》(Minerva书房,2020)是一册收录中国思想基础用语的力作。

(渡边义浩)

二 先秦两汉

吉永慎二郎《〈春秋〉新研究》(汲古书院,2019)从以往的“从经到传”提出“从原‘传’到经”的新视角。作者将《春秋左氏经》的经文全部分成①抽出之文②抽出编作之文③编作之文④无传的经文这几类,将①②作为“抽出系经文”,③④作为“编作系经文”。在此基础上认为,《原左氏传》的概念指的是以下部分的传文文本,即从今本《左传》中除掉对该本中收录的《春秋左氏经》经文的解经文以及《左氏传》成书当时及之后的附加传文,它构成了今本《左传》的相应部分(x)。书中声明,《原左氏

传》成书之后，在《春秋左氏传》成书后制作《春秋左氏经》时，可能有从《原左氏传》中删除的部分（y），但因为那无法入手，所以将（x）称作《原左氏传》加以使用。在此前提下，论证“‘从经到传’这一视角向‘从原‘传’到经’这一视角的哥白尼式转向”是该书的主线。该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扯下既有价值观的帷幔，从而得到“从传到经”这一新视角。且正因为是其最大的价值，应该讨论的点也在这里。如上所述，作者认为《春秋左氏经》是经过①至④的过程从《原左传》衍生而来的。问题在于④无传的经文上。如果要经历“从传到经”这一过程，经文必然会以某种形式在传中留下痕迹。但既然是无传，也就难以寻找这种痕迹。作者指出其中包含编者意图的可能性等，如果能在所有事例中详细说明这一意图，相信本书的说服力会进一步增强。

冈本光生《先秦思想史上的墨家》（汲古书院，2020）是作者长年从事墨子研究的系列论文结集。该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序章“墨子”和第一章“‘自爱的’个人的发现”中所展现的，将《墨子》这一文本尽可能当作一个统一体加以把握。作者认为以往的某些研究放弃了对墨家思想进行整合性理解，他在继承板野长八认为墨家思想中具有对人和社会的一贯主张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断言《尚贤》各篇、《兼爱》各篇虽然在修辞上有所区别，但并没有思想本质上的转变。在讨论以往被视作自相矛盾的点时，作者聚焦“自爱”这一关键词，以此为基底，将《尚贤》上篇中的君主和《兼爱》上篇中的个人都视作“自爱的”存在，认为这两篇的思想中“自爱”这一概念贯穿始终。此外，本书还指出墨家的天并非宗教的实在，而是为了维持秩序而被召唤的履行法的功能的实在，并探讨上博楚简《鬼神》之明》和《公孟》篇，论证二者形成于同一时期，具体则成立于公元前60、70年后。本书内容丰富，可谓今后墨家研究必须参考之作。

藪敏裕《〈毛诗〉的文献学研究——以与出土文献的比较为中心》（汲古书院，2020）结合新的出土文献对《毛诗》展开论述。该书的特点就在于结合出土文献论述《毛诗》，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设想时代背景是导致其他文献中《诗》的解释和《毛传》的解释不一致的原因。譬如，在对《诗经》征役诗的解释中，作者以《毛传》中的“王事靡盬”这一解释不见于《史记》《淮南子》等为根据，认为《毛传》成书于汉代宣帝、元帝时期以后，并说明如此解释的原因在于宣帝时期之后长时期的征兵、征役成为问题。像这样，将当时的政治性现实性问题作为某种解释形成的背景，

作者的这一研究方法值得高度评价。

古胜隆一《目录学的诞生——刘向催生的书籍文化》(京大人文研东方学丛书6, 临川书店, 2019)对目录学的始祖刘向展开整体探讨。该书不仅论述目录学史上作为一个“点”的刘向,更将其牢牢置于时代的洪流中,进而对刘向以后的目录学也展开探讨。在日本,如此这般全面地对目录学以及刘向和刘向之后的目录学学者展开探讨的著作,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其论点的创新,可以举出以下几点。一,指出刘向等人接到的命令是典校收藏在宫中的书籍,具体而言,就是在“温室(温室殿)”校阅位于未央宫前殿北侧的石渠阁、天禄阁的藏书,即“中书”“秘书”。此前,我们并不明确校书这项工作具体在哪里进行,根据这一观点则变得明确了。二,由于经刘向整理的书籍都归皇室所有,刘向所校并附有“叙录”的书籍并未在民间广泛流通,这一论点也很重要。这一见解认为:虽然以刘向等的校书工作为分水岭,确实发生了适用于整个学术的文本改革,但这些文本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运用。本书最大的长处在于吸收了以余嘉锡为代表的目录学学者以及内山直树《关于〈七略〉系统性的考察》(千叶大学《人文研究》39, 2010)、秋山阳一郎《刘向本战国策的文献学研究——二刘校书研究序说》(朋友书店, 2018)等近现代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将以刘向为中心的目录学汇集成书以飨读者。古胜隆一关于目录学的书还有与嘉濂达男、内山直树合作的2种译著,译自中国学者余嘉锡,即:《古书通例——中国文献学入门》(平凡社东洋文库, 2008)和《目录学发微——中国文献分类法》(平凡社东洋文库, 2013),可一并参照。

渡边义浩《“古典中国”的形成与王莽》(汲古书院, 2019)对其独创的“古典中国”论的形成和成立展开论述。作者首先将“古典中国”论放置到时代划分论争的语境之中。作者将“古典中国”设定为儒教主张所表达的国家典范,以此为基础,将中国史区分为“原中国”“古典中国”“近世中国”“近代中国”四个阶段。接着,设定三个其认为成立于后汉的“古典中国”的指标:大一统、华夷、天子。以此为基础,该书讨论了“古典中国”的形成以及成立。“古典中国”从形成到成立的阶段笔者梳理如下:

眭弘上书、刘向《列女传》、刘歆《七略》(“古典中国”形成要素的产生)→王莽的古典国制(“古典中国”的形成)→班固《汉书》(描述从前汉至写作《汉书》时期“古典中国”的形成史)→白虎观会议(“古典中国”的成立)

据此，笔者谈谈作者所提倡的“古典中国”论和“儒教国家”论。作者说，“我们一直认为白虎观会议上‘儒教国家’的完成意味着‘儒教国家’的实现，本章则要论证这也是‘古典中国’的实现”（《“古典中国”的形成与王莽》第261页）。不过，作者提倡的后汉“儒教国家”论是借助两大论据得以成立的：在《白虎通》和现实产生龃龉的情况下，同时运用故事加以补充。也即是说，不是单纯将后汉“儒教国家”等同于“古典中国”，相反，以《白虎通》为规范形成的作为时代划分的“古典中国”和用故事将规范无法填补的现实正统化的后汉“儒教国家”，这二者应该明确加以区分，书里面应当也是这么做的。因此，为了让作者积累的研究更明确地展示给读者，把“古典中国”这一时代划分作为背景，更加强调后汉“儒教国家”作为现实的存在形态得以成立，这样才能让读者明确本研究运用这些分析概念的意义。

笠原祥士郎《王充思想研究》（朋友书店，2020）是由作者多年积累的王充研究汇集而成。说到王充研究，以往多着眼于《论衡》中可见的唯物论性质的记述，说明其先进性。但是现在，正如大久保隆郎《王充思想百态》（汲古书院，2010）中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所示，虚心坦诚地钻研公元2世纪生活于后汉最鼎盛时期的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这样的研究已经成为主流。本书也处于这一谱系之中。尤其是第九章“王充思想中的儒家与王朝”，反驳以往很多研究认为“颂汉论是对汉王朝的谄媚，是王充为了自保的局限”这一观点，主张《论衡》撰写的最大目的就在于提倡颂汉论。作者认为王充否定人格天的存在，代之以对宿命的倡导都是为主张颂汉论做准备。虽然对这一观点有必要持保留意见，但作者认为颂汉论是王充思想的根本这一点，在继承大久保先生的见解之上进一步推进，具有重大意义。不过作者的论述中引人注意的是非常重视人类有为的活动这一点。作者将“夫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解释为“人的‘知巧’所带来的‘伪性’和天赋的自然‘真性’没有本质差异，指出了人类有为的活动相当重要”（《王充思想研究》第59页）。但是，这段记述所在的段落，论述重点在于居于上位的人引领教导居于低位的人，“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应当理解为“伪的人只要人（居于上位者，或即圣人）施加智慧和技巧，自然和与天相符合的真的无异”。这里所说的人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个体，而是指居于上位的人，通过居于上位的人施加智慧和技巧的作用，伪的人也会变得与真的无异。

也就是说，从这一句话并不能推出人类个体有为的活动的的重要性。虽说如此，这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本书各章节所展开的论述非常稳妥，是今后的王充研究必须参考之作，这一点是不变的。

堀池信夫《汉代思想论——樱邑文稿2》（明治书院，2020）是作者关于汉代的论文的结集。该书由“音律学的射程”“汉代思想论”“郑玄学的周边”三篇组成，篇幅所限，本述评聚焦“汉代思想论”中收录的《关于汉代的“权”》一文。在中国思想界，“权”这一概念虽然被看作常识，可能正因为如此，此前并没有太多深入的讨论。作者的结论是，尽管在汉代“权”的重要性得到认识，出现了要加以整顿的倾向，但是未能深化，甚至走向了混乱。那是因为想要立经的这一急切动向，没有带来能够让人警惕“权”的重大陷阱的认识，结果从汉代至清末，“权”成了儒教内部始终怀揣一颗炸弹的缘由。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过，说走向混乱这一点，需要持保留意见。后汉出现了像王符和崔寔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对“权”这一概念运用自如，谋求儒与法的并存。或许作者将这种状况视作走向混乱，但笔者认为反而应该积极评价“权”的灵活性。作者2019年留下本书仙逝，这一课题留给了下一代的研究者。

（长谷川隆一）

三 魏晋南北朝

首先介绍大上正美《从〈世说新语〉读竹林七贤》（朝仓书店，2019）。该书力图从《世说新语》及其注释中所引插话等内容，分别解读被称作“竹林七贤”的几位人物的具体言行。作者在《阮籍、嵇康的文学》（创文社，2000）一书中，严格区别行动层面的文学性和语言表现的行为，贴合每个作品进行内在的解读，从这一立场叩问从事文学的价值。然而，《从〈世说新语〉读竹林七贤》一书则对《世说新语》做如下定性：从个体贯彻自我的姿态，即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积极和消极将自我贯彻到底，并以此来判断其个性。进而，将书中所写“七贤”各人的多样的言行，理解为个体多面的生存状态，力图把握其各自的精神（志向）和个性。

佛教研究方面，可举出船山彻《六朝隋唐佛教展开史》（法藏馆，2019）。作为思想与实践方面的事例，本书对“科段”和“音义书”等中国特有的针对汉译经典的注释形态以及戒律、佛教中的圣者观和舍身等展开探讨。

据此，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综合梳理宋、齐、梁朝中国佛教的独特发展，力图通览这一时期至隋唐以降的佛教史。

作为本书的一大特点需要提及的是，作者原本从印度佛教开始从事佛教研究，之后专攻中国佛教史，本书的重点在于追究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连续性。譬如，本书第一篇第三章考察“如是我闻”和“如是我闻一时”这两个句子。此前的研究认为，汉译佛典中只能见到“如是我闻”这一开头。但作者认为六朝时代同时存在继承了梵文文献经典解释的“如是我闻一时”这一说法，促使学界从根本上重审中国佛教的经典阐释史。

关于本书还有一篇详细的书评，即远藤祐介《书评：船山彻〈六朝隋唐佛教展开史〉》（《六朝学术学会报》21，2020）。另外，作者还出版了《佛教的圣者——史实与愿望的记录》（《京大人文研东方学丛书》8，临川书店，2019）一书，通过圣者观以更广阔的视野考察六朝至初唐的中国佛教史。

关于佛教方面的成果，还要介绍一下向井佑介的《中国初期佛塔的研究》（临川书店，2020）。该书以考古资料为中心，综合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和图像资料，考证起源于印度的佛塔在中国如何被接受。

道教研究方面，有林佳惠《六朝江南道教研究——陆修静的灵宝经观和古灵宝经》（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9）。本书围绕灵宝经的论述，促使我们从根本上重审初期经典的写作主体是谁、初期经典形成于何时等问题。关于初期灵宝经的形成，以往的研究中特别成为问题的是，在公认为陆修静编纂的《灵宝经目录》（以下称《目录》）中，灵宝经被分成了“元始旧经紫薇金格目三十六卷”（“元始旧经”）和“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仙公新经”）两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古灵宝经存在两个系统这一点本身，到底“能否成为灵宝经研究的前提”？进而针对陆修静对“元始旧经”和“仙公新经”的分类标准及其背后的思想、初期灵宝经中“元始旧经”和“仙公新经”这一二分概念的有无、从收录于《云笈七签》的《灵宝经目序》中的记述看陆修静对灵宝经的认识等问题展开探讨。通过这些考察，重新审视“元始旧经”和“仙公新经”这一二分概念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根据作者的见解，陆修静“目录”中存在的“元始旧经”和“仙公新经”这一二分概念，在其以前的灵宝经中并不存在，也不能判定灵宝经的作者撰写经典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书中认为，两个系统的划分，很可能是陆修静基于他对灵宝经的认识将现存的灵宝经加以整理和系统化时创造出来的。在陆修静对灵宝经的认识中，将被认为

由元始天尊讲述的灵宝经视作刘宋建国时作为祥瑞出现的“天书”，并置于灵宝经体系的中心，这就是“元始旧经”。同时，将当时存在的其他灵宝经视作刘宋以前作为“天书”存在并就此传世的经典，这就是“仙公新经”。

对读者而言略感不足的是，如果正如作者所言“元始旧经”和“仙公新经”这一二分概念是陆修静的发明，那么陆修静介入以前的灵宝经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关于这一点书中没有论及。不过本书的研究脱离此前很长时期在早期灵宝经研究中被当作前提的“道流”这一设定，并且吸纳了进入21世纪之后谢世维、吕鹏志、张超然等人提倡的灵宝经的“天书”观，在此基础上对此前的灵宝经研究状况进行根本性重审，对于思考灵宝经和初期道教的形成非常富于启发意义。又，本书最大的特征在于，将灵宝经本身的形成过程和陆修静对其的整理和系统化结果完全分开来考虑。此前我们不加分辨地将陆修静的《目录》作为前提，借助本书我们得以注意到这一滤镜的存在，甚至可以说由此获得了去除这一滤镜，弄清早期灵宝经实际状况的可能性。

此外，神塚淑子《道教思想10讲》（岩波书店，2020）出版了。本书从《老子》中“道”的思想、生命观、宇宙论、救济思想、修养论、伦理、与佛教的关系等围绕思想层面的10个主题，对内涵多样的道教进行解说。本书内容涵盖了作者在《六朝道教思想研究》（创文社，1999）和《道教经典的形成与佛教》（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等书中所论述的相关成果，包括以《真诰》为首的上清经的世界观研究、《太平经》思想研究、六朝时代灵宝经与佛教关系研究等等，从中可以窥知长期以来引领日本道教研究的作者所做的部分工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以前儒教所具有的权威已经丧失，多样的价值观开始显现。儒佛道三教相互竞争，知识人将价值置于兼修玄学、儒学、文学、史学这四学之上。吉川忠夫《六朝隋唐文史哲论集》（法藏馆，2020）立足于这种时代思潮，全面论述这一时代的学术思想和宗教。本书是从作者在《六朝精神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84）之后发表的涉及文史哲的广泛的研究成果中挑选编纂而成的两册论文集，分别附有副标题Ⅰ“人·家·学术”、Ⅱ“宗教之诸相”。

Ⅰ“人·家·学术”由两部分组成。第Ⅰ部“人与家”主要论述皇甫谧《笃终论》、陶渊明《诫子书》、颜延之《庭诰》、徐勉《诫子书》等家戒和家训。里面以每种家戒或家训的作者及其家族事迹以及对子孙的寄托

为线索，从中可以看出围绕六朝时代多样的价值观如何存在于个人内部这一问题每个人所呈现的具体面貌。第Ⅱ部“学术”首先聚焦把学术作为家业代代相传的世家（“学门”“学家”“书生门户”），他们肩负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和思想。这部分内容在继承《六朝精神史研究》中的范氏研究和颜氏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第Ⅱ部除了对家族的研究，还就一些出现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区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学术趋势展开论述，如荆州学的发展和汲冢书的发现等。从中可以看出学术和思想的主体在多样价值观的滥觞之中如何展开自己的学术思想，如何社会性地存在。

在Ⅱ“宗教之诸相”的各篇论文中，作者的考察也不仅局限于思想的内容和发展，同样兼及其思考主体在时代趋势中如何社会性地存在。第七章“襄阳道安集团”、第八章“五、六世纪东方沿海地区与佛教——从摄山栖霞寺的历史说起”论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体系如何在与中国区域社会的相互关联中发展。作者认为，六朝时代是一个佛教和道教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各层的“宗教时代”，其根底是人们悔罪意识觉悟的加深。第一章“中国六朝时代的宗教问题”围绕后汉末期见诸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首过”“思过”，抑或在佛教“斋堂”“功德处”“道场”的忏悔等展开论述。还将刘宋王微所作《告灵文》视作六朝时代人们内心存在深刻的悔罪意识的一个例子。进而，就汉代“请室”和道教中的“静室”、佛教轮回报应思想为基础债偿观念、《真诰》等书中的“谪仙人”观念、《太平经》中的承负观等展开论述，把悔罪意识视作“构成宗教核心之物”，认为这是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宗教时代”的一大要因。书中还收录了与上清派有密切关联的论文，如第五章“许迈传”等。以《真诰研究（译注篇）》（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0）为代表，作者至今在上清派研究领域开展了很多重要研究。“许迈传”中作为主题的东晋许迈，是《真诰》的作者之一许谧的兄长。本文主要通过读《晋书》和《真诰》，查明许迈的生前事迹，同时探讨《真诰》中关于其死后消息的记述。文章讲述许迈虽然是东晋许氏首屈一指的名道士，但在《真诰》中则被迫扮演关照诸神、鼓励被训诫的人们这一角色。并且，梳理了史书中关于许氏一家以及与许迈有深交的王羲之所属的王氏、与王氏存在婚戚关系的郗氏、与许氏存在地缘关系和婚戚关系的葛氏等的记述，以及《真诰》中关于许迈死后地位的记载。从中可以窥知，《真诰》成书时，其周边相关人员与天师道具有深刻关联，他们以通过“宗教”结合起来的“家”为基

基础维持着信仰。

如上所述，在 2019 和 2020 年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出版物中，主要为佛教和道教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并非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而是属于此前已有丰厚研究积淀的领域的成果，从中也能看到促使我们对以往研究进行重审的视角。

(富田绘美)

四 隋唐

首先要举出船山彻《六朝隋唐佛教展开史》(法藏馆, 2019)。作者长年专攻印度、西藏和中国佛教, 本书由其 2000 年以后发表的论文整理而成。虽然在上一节魏晋南北朝中已有所涉及, 之所以在本节关于隋唐的部分特意举出, 是因为作者说“六朝佛教的发展给随后的隋唐佛教定性的情况不在少数”。例如第一篇第五章“真谛三藏的活动与著作”论述活跃于齐梁时期的真谛的译经活动, 阐述真谛并非使用梵语而是用他的汉译基于汉字对印度佛教思想进行解说, 或是用伪经加以解释。进而说明, 通过将真谛的这些活动与玄奘对比, 可以理解玄奘思想的真正价值。这样的论述是长期广泛研究佛教的作者才有可能提出的见解。又, 第二篇第一章“隋唐以前的戒律接受史(概观)”概述唐代以前戒律的发展, “北朝的地论宗”这部分认为, 并非《十诵律》而是“法藏部的《四分律》受重视的倾向发展起来”, 以至“唐代出现了《四分律》中心主义”, 这部分同时描绘出真谛译经工作的过程以及戒律接受史的这种变迁。要理解本书推荐一并参考船山彻《佛典是如何被汉译的——当梵经成为经典》(岩波书店, 2013), 该书论述梵文佛典成为汉译佛典的过程。

关于武则天时期到唐玄宗时期净土教动向的研究, 这里介绍加藤弘孝《唐中期净土教善导流的各种形态——以〈念佛三昧宝王论〉和〈念佛镜〉为中心》(法藏馆, 2020)。正如作者所言, 本书是对塚本善隆《中国净土教史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四卷, 大东出版社, 1976)的继承和发展。本书作为论述对象的唐中期处于净土教、天台宗、三阶教等各宗派相互交错的状况之中。作者从中选取净土教的《念佛三昧宝王论》(以下简称《宝王论》)和《念佛镜》这两种文献作为分析对象, 探讨唐中期的净土教如何接受其他各宗派的问题。作者首先指出, 《宝王论》是大历 9 年(774)

以后由飞锡撰述的，其思想“从净土教人的立场接受（统合）了以三阶教为首的各派思想”。而《念佛镜》是由道镜、善导等人于天宝15载（756）以前所撰，内容是对三阶教的批判等等。撰述的顺序是从《念佛镜》到《宝王论》，《念佛镜》中出现的批判被吸纳到《宝王论》中。当时飞锡并非用三阶教的经典，而是用《法华经》和《梵网经》等正统经典来建构理论。作者认为这“意味着用佛教界通行的观念范畴将三阶教佛教化（统合）了”。各宗派如何在与其他宗派的关联中形成各自的理论，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进展。

除了围绕这些经典的动向，佛教信仰也会通过佛像和壁画等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而展开。以佛教美术为对象的研究，这里介绍八木春生《中国佛教美术的展开——以唐代前期为中心》（法藏馆，2019）一书。作者在序言中提出其问题意识在于“尽可能地梳理唐代前期佛教美术的状况”。通过敦煌莫高窟、龙门造像和各地造像探讨这三部分内容，对该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论述。作者通过翔实的个案研究指出，特别在雕像方面，“虽然八世纪初人们对于如来像的肉体表现理解渐趋相通，相似样式和形式的造像在各地出现，但很快就被其他一些不同的样式和形式所取代”，在这些可被称作“古典样式”的样式和形式出现之后，“接着就向破坏它们的方向发展”。作者总结这是“因为到了文化的烂熟期”。另外，与此相关，论述唐代佛教美术的还有肥田路美责编的《亚洲佛教美术论集 东亚Ⅱ 隋唐》（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19），该书收录了18篇论文。

说到唐代美术，另外还可举出书法。2019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颜真卿展”，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首次来日造成巨大冲击。关于颜真卿，这里介绍吉川忠夫《颜真卿传》（法藏馆，2019）一书。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与王羲之并称双璧。作者早已发表过关于颜之推和颜师古的研究（《颜之推论》《颜师古的〈汉书〉注》，皆收于《六朝精神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84）。包括终章在内，该书由八章构成，将颜真卿的一生分成各个时期展开论述。行文以史书中的记述为基础，另援用乐府、诗歌、碑文和书简，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与真人等身的”颜真卿。特别是“抚州刺史时期”一章，作者聚焦颜氏相继书写的《麻姑山仙坛记》《魏夫人仙坛记》《华姑仙坛记》等道教方面的碑文。征引一切文献，对这些碑文展开细致解读。终章“书法与人”论及两《唐书》几乎没有记载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这一点。作者最后指出，“比起书法及其他，最重要的还是人本身”，强调作为

人的颜真卿。而且作者认为，“书法艺术”不过是颜真卿的一个侧面，他一定是把“诸艺”和“德义”兼备的人作为理想。进而，将对其书法的评价归结为“宋代对颜真卿书法的高度评价往往与节义之人颜真卿这一对其人的评价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另外，关于此书尚有宫崎洋一、江川式部、井波律子三人所写书评，分别刊登在《书论》（45号）、《唐代史研究》（23号）、《每日新闻》（2019年2月24日“东京朝刊”）上。

除了上述围绕颜真卿的研究，吉川先生还发表了多篇关于隋唐的论文。将这些研究结集，作者又出版了《六朝隋唐文史哲论集》Ⅰ“人·家·学术”和Ⅱ“宗教之诸相”（同由法藏馆出版，2020）这两册书。关于六朝的内容请参照上述六朝的部分。Ⅰ中收录了五篇主要论述隋唐的论文，Ⅱ中收录了八篇。如Ⅱ中的“后记”所言，这两册书是由作者在《六朝精神史研究》之后发表的诸篇论文大致按照时代顺序编排而成。两书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在此难以详细介绍。其中关于思想的部分以佛教和道教为中心，主要收录在Ⅱ中。选取几篇介绍如下。第十二章“王远知传”围绕上清派、茅山派道士王远知，论述茅山派的道系。又，第十四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佛教与劳动问题”围绕佛教中的农业劳动展开论述。因为会破不杀生戒，沙门干农活本来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作者指出，为了维持教团经营或是作为“参学之场、修行之场”，在禅宗教团开垦等农活或作业是受到肯定的，这一点很有意思。第十六章“裴休传——唐代一士大夫与佛教”用长达180页的篇幅详细描绘出官至宰相的裴休与佛教的距离及其与宣宗复佛的关联。

关于经书的研究，首先要举出野间文史《孝经——唐玄宗御注原文翻译（附孔安国〈传〉）》（明德出版社，2020）的出版。本书以《孝经》的日语训读、现代日语翻译和玄宗御注的翻译为中心构成，另附六朝时期的伪作孔安国《传》的训读。本书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将复杂的文本谱系加以整理，把今古文的对比、《孝经》的传入和结构以鸟瞰图的形式展示出来这一点。其次，是补论中论述的关于刘炫《孝经述议》的发现。刘炫曾指出孔安国《传》中摘引了非儒家文献《管子》的大量内容。但正如作者所言，在此前《古文孝经》和孔安国《传》的研究中这一点似乎并未受到多大关注。着眼于此的是乔秀岩、叶纯芳、顾迁编译的《孝经述议复原研究》（崇文书局，2016，该书是林秀一《关于孝经述议复原的研究》〔文求堂书店，1953〕一书的中译本）中所附的《古文孝经孔传述议读本》一文。野

间文史之书吸收了该文的研究成果，将孔安国《传》中与《管子》内容一致的地方用粗体标记出来。由于毕竟是通识书，书中详细的考证都省略了，这有些遗憾。不过，能够读到由作者此前厚重的各项研究所支撑的《御注孝经》的日译，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接着介绍山口谣司《唐代通行〈尚书〉研究 从写本到刊本》（勉诚出版，2019）。提起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尚书》文本，一般都会想到阮元《十三经注疏》的《尚书正义》或吉川幸次郎《尚书正义定本》。但是，这些都是以宋刻本为底本，与唐代以前以写本形式流通的情况不一样。作者也说“至于宋代以后的文献，借助此后急速发展的印刷技术，文本一定程度上固定下来”，正如本书所述，在版本上也存在异同。此类复原《尚书》的尝试从清朝考据学兴起之时就已开始。例如，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另外，在日本则有斯波六郎和神田喜一郎的研究。特别是清朝考据学者的研究是运用石刻资料等复原汉代文本的尝试。本书在参照此类研究成果的同时，通过对这些研究未能参照的敦煌写本和现存于日本的写本进行详细探讨，旨在复原唐代通行的《尚书》。作者通过考察指出，经文和传文之间存在不稳定性，尤其是孔安国传具有非常大的不稳定性。文中认为，这是由于写本不具有今天我们对文本所认为的那种稳定性。并且，作者说，此类唐写本《尚书》的复原将成为魏晋《尚书》和宋代以后的《尚书》解释之间的桥梁。这些成果是在细致的考证和庞大的论据支撑的基础上得出的。期待在本书成果的基础上《尚书》研究进一步推进。

（关俊史）

五 宋元

2019年的成果首先要举出土田健次郎《朱熹的思想体系》（汲古书院，2019）。朱熹的思想被认为“具有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规模”且“非常注重论述的整合性和系统性”，本书旨在详尽论述其全貌。作者已经发表了数篇论述朱熹思想的前沿论文，本书是将它们进行分解、重构，加之大幅度的修改扩充而成。论旨涉及多个方面，其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朱熹的思想以成圣为目标，即心的认知与理完全合一，因此根本上是一种以内心问题为核心的“心学”，格物和居敬这样的修养论自不用说，理气论这样的对世

界的解释也是为了有助于成圣这一目的而建构起来的。如此高质量的对朱熹思想的整体结构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以往未曾有过，加之其明快的笔致，本书今后将收获众多的读者吧。

相对而言，土田先生的上述著作将重心放在阐明思想的内部结构上，而下面要举出的福谷彬《南宋道学的展开》（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9）则更关心思想和修养论所具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及功效、经学上的位置等。本书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多角度论述朱熹、陈亮、陆九渊等南宋道学思想家通过熟读《孟子》，从中不仅引导出哲学、修养论，甚至于政治姿态和说服他者的话术，进而各自确立对他者的姿态。书中还聚焦陈亮和陆九渊与朱熹的论争，揭示这样一个事实：支撑各思想家主张的，依然是以《孟子》为资源的思考或话术等。关于朱熹对君权的态度，依据“壬午应诏封事”和“戊申封事”，指出朱熹对于把皇帝个人的见解直接投射在实际的政策立案和决定上非常谨慎，这个观点也很重要。此外，还尝试调解朱熹《春秋》学与《资治通鉴纲目》的矛盾，是一部积极挑战过往疑案的研究力作。

接下来介绍松下道信《宋金元道教内丹思想研究》（汲古书院，2019），该书论述宋代至元朝全真教和南宗、钟吕派的内丹思想。二战前常盘大定一方面高度评价全真教通过接近佛教摄取“性功”，成为摆脱“长生不死”迷信的“新道教”，一方面将元朝时期其与南宗的融合称作“全真教的堕落”。此后“新道教”作为一个研究概念固定下来，本书作者从这一结构所缠绕的现代性着眼，通过详细探讨南宗和全真教的性命说，论证这一结构无法成立。作者认为，原本张伯端的《悟真篇》就同时论及“命功”和“性功”，二者是互补关系，它是面向不能一举达到“无漏”之境的中下根人讲述的。与此相对，全真教废除一切人为，追求一举抓住“真性”，站在上根人的立场，认为这如果达成，“命功”也能自然练就。换言之，该书认为，全真教与南宗之间的分歧是起因于作为教化对象的修行者的根性资质的不同，并非由于全真教是脱离旧道教的“新道教”。此外，关于被视作“堕落”的两教融合，书中也指出，作为背景双方本来就包含互相接近的要素，譬如南宗方面从白玉蟾可见对“性”的重视，全真教方面则存在无法彻底遵从上根人修行方法的修行者。

接下来是2020年的。首先要举出的是为纪念早稻田大学教授土田健次郎荣休，由其受业弟子15人撰稿而成的《朱子学与其展开——土田健次郎教授退休纪念论集》（汲古书院，2020）。关于宋元方面，登载了以垣内景

子《朱子与两位亚圣》、宫下和大《朱熹言论中感情负债的考察——以君臣关系和家族关系中的恩为中心》为首的论文。其中，松野敏之《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编纂考——黄土毅语类与黎靖德语类》是篇好文。该论文考究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所谓的楠本本）的编纂。《朱子语类》大致可分为池录→蜀类→徽类→徽类再校（魏克愚校正）和池录、蜀类等→黎靖德《语类》两个系统，楠本本是从徽类再校而来的手抄本。楠本本与黎氏《语类》存在不同，如包含黎氏《语类》中所没有的记述等，其原因一直广受争议，松野先生认为，“徽类→徽类再校”阶段的改变仅限于文字校对，“蜀类→徽类”也只限于文字校对和删除重复记录等，因此楠本本非常忠实地保留了蜀类的原型。由此，作者推论楠本本与黎氏《语类》的不同是由黎靖德的编纂所致。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石立善《关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兼论语类体的形成》（《日本中国学会报》60，2008），加上现在这篇，我们有了更加明了的视野。

接下来介绍中纯夫编、朱子语类大学篇研究会译注《〈朱子语类〉译注卷十六下 卷十七》（汲古书院，2020）。《朱子语类》卷十四至十八收录围绕《大学》的问答，该研究会此前已经出版了其中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前半部分的译注。本书是其第4集，通过这些翻译工作，我们将重新认识到《大学章句》是如何经历庞大的思索而成就的。本书以卷十六和卷十七为范围，前者是《大学》传八章至传十章，后者是《大学或问》经一章、传一章至传三章。到这几卷，围绕“格物致知”和“诚意”等重要术语的部分结束，转而展开了非常细致的关于经书解释的议论。不过这对于他们而言是做学问，是“格物穷理”的实践。本书对各话题中的经学含义的探究自不用说，甚至连“著”“似”“去得”等容易被忽视的细小的白话虚词都能顾及到，是一本清楚明快的译注，朱熹等人“格物穷理”的现场被生动地再现出来。

（原信太郎アレシャンドレ）

六 明清

2019年刊行的著作中，首先要举出岩本真利绘《明代的专制政治》（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9）。本书详细追踪明代皇帝的个人意思经过怎样的流程和运作得以实现等问题，本来应该在中国史领域进行介绍，其中第六

章、第七章分析明代后期思想家管志道的政治思想。关于管志道早已有荒木见悟的厚重研究，本书则是从政治立场与思想的关联这一视角切入。作者首先聚焦张居正夺情问题（张居正不为父亲服丧引发的政治争端）爆发时管志道的举动。管志道尽管与赵用贤等夺情批判者关系亲近，但因为正在求职，他以“没有言责”为由避开批判，优先选择保身。之后，虽然一度得到官职却被罢免。张居正逝世后，批判者们逐渐复权，当时正为复职而奔走的管志道试图搭便船，费尽心机制造自己是因批判张居正而被撤职的印象。一般认为管志道还乡后彻底放弃了出仕的念头，一味沉入其内心世界，本书则呈现出他其实还有为求职而如此疯狂的一面。接着，作者分析管志道的《从先维俗议》，探讨其政治思想。其中所描绘的是这样一幅理想世界：在管束三教的道统的继承人天子之下，官僚和万民只是各遵本分、各司其职，绝不越雷池一步。特别是东林党认为科道官之外的人也有“言责”，而管志道则不以为然。作者推论，这是管志道想在夺情问题爆发时优先选择保身，而未对张居正展开批判的行为合法化的意图使然。如此，本书通过增加政治立场这一维度，可以说成功地展现出一幅新的管志道形象。

接下来介绍井上彻《华夷之间——明代儒教化与宗族》（研文出版，2019）。作者在2000年出版了其上一本著作《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研文出版），《华夷之间》一书是在这之后发表的多篇论文的结集，将视角设定在中国各地域中尤以宗族势力兴盛而著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论述这一汉族与非汉族杂居的边境之地在16世纪之后经由何种过程被汉族的儒教文化所统摄（即儒教化）。这一过程的论述高屋建瓴，论笔所及从民族叛乱的频发及平定、魏校捣毁淫祠以及祭祖的普及、社学和里学的设立、黄佐的乡礼实践、乡绅的抬头及至珠江三角洲这一与中原无二的中国区域社会的形成。虽然未涉及哲学性的分析，但对于思考明代中叶以后儒教如何在区域社会中渗透并发挥作用是一部不可或缺的研究著作。

2020年出版的成果，首先要举出的是河内利治《黄道周研究》（汲古书院，2020）。本书是“综合研究黄道周这一人物的成果汇编”。相比黄道周的思想结构和学术思想，本书在其生平和事迹、与徐霞客和陈子龙等人的交友关系、夫人蔡玉卿的传记和书画等周边信息的考证和整理上着墨甚多，为我们提供了探讨明清文化研究的材料。黄道周在鉴赏书法作品时据说颇为重视“遒媚”，本书围绕这一价值标准的考察也令人深感兴趣。不过，如书中所言，在黄道周的意识中书法终究是“小道”，学术思想才被认为是其

本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声称综合研究，却对称得上黄氏主要著作的《易象正》和《三易洞玑》等“避而不谈”，还是让人感到些许不足。书中作为“附章”收录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的节译应当也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将继续关注作者本人今后的研究进展。

接下来是桥本敬司《何谓人性——中国思想的活力》（汲古书院，2020）。本书是2011年逝世的作者的遗稿集。全书由七章构成，其中前五章论述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时代的思想家。涉及宋明的是后面的第六章、第七章。其中，第六章是陆象山论。作者描绘的陆象山形象看似明快。陆象山把世界、存在、内心视作一元论的，认为所有事物的理只有一个，人的内心也具备这种理（“本心”），所谓学问就是确立这种内心（“立乎其大者”）。不过，从个别的社会规范以至人心、宇宙，这些全部包括在内，所谓理只有一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跟道学的“理一”有什么不同，另外，陆象山是否完全没有设想对应于“分殊”的个别而具体的理，关于这些点还有不明确的地方。第七章是一篇生动的王阳明论。尤其是其中的第三节，从身体的视角重新把握王阳明的思想。文中认为，王阳明经历龙场体验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体才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由此解构了朱子学的语言化知识。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本来性/现实性这一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分析框架展开批判，认为这一图式遮蔽了身体。提倡这一框架的荒木见悟虽然主张本来性和现实性密不可分，但在论述知行合一的阶段，他认为知行始终是在本来性而非在其所发生的现实中合一，将现实的身体置之度外，将知行收回于本来性之中。用作者的话说，知行正是在现实的身体中才能合一，通过构筑本来性这一“幻想故事”来展开议论，就等于用王阳明批判并解构了的朱子学知识来分析王阳明。要言之，作者认为朱子学与阳明学所追求的知根本不同，所以不能将二者并置于同一平面上进行论述，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王阳明思想研究非常重要。

（原信太郎アレシヤンドレ）

七 日本汉学

本学会的大会设立“日本汉学”小组会至今已10年。“日本汉学”这一称呼能够涵盖的学术领域很广，超越了所谓“文史哲”的分野之别和时代划分。“日本汉学”权且可以定义为“围绕在日本列岛书写的汉文文献的

研究”，儒学者们掺杂假名的著作应该也能囊括进来，另外，诗文姑且不论，关于僧侣宗教方面的汉文文献是否属于“日本汉学”，意见则似乎有些分歧。如此，本学会的“日本汉学”甚至可以说泛泛不得要领，不过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吧。因为通过“日本汉学”这一框架对形形色色的研究进行归纳把握也会有不少发现。

首先要举出的是泷川幸司、中本大、福岛理子、合山林太郎编《作为文化装置的日本汉文学》（勉诚出版，2019），这本论文集对于思考“日本汉学”这一领域的困难和有趣程度富于启发。所收论文 Matthew Fraleigh《英语圈的日本汉文学研究与日本汉诗文》介绍关于“日本汉诗”的译语（Shino-Japanese poem, Sinitic Poem 等）的讨论。离开日语或中文，让其他语言介入进来，有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汉学”错综复杂的状况吧。此外，书中还收录了论述日本汉诗文对近代中国人产生影响的论文，促使我们对一味强调从中国到日本这种单向影响关系的论述方式进行反思。

2019年4月公布新年号“令和”，是一个让很多人意识到日本文化中的“汉学”问题的事件。在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2019年4月1日）中，出处《万叶集》被称作“象征我国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久传统的国书”。现在的“国书”概念（以“汉籍”为对立概念）与近代日本学术机构的编组问题密不可分。关于这一点，2019年发表的品田悦一与斋藤希史著《“国书”的起源——近代日本的古典编成》有详细论述。围绕年号的文化和学问，水上雅晴编，高田宗平协编《年号与东亚——改元的思想与文化》（八木书店古书出版部，2019）是一本充实的论文集。正如书中清水正之《年号与历法——本居宣长的人为“人作”与自然“神作”》一文所指出，本居宣长否定了从中国传来的、在他看来烦杂的历法这一事物。先不说什么“日本式的年号”，平成年代果真会有人抛开“汉意”^①来讨论“何谓日式历法”吗？

在近代日本学术领域的划分中，《日本书纪》因为是用汉文写成，在“国文学”的框架中一直被边缘化。2020年是《日本书纪》编纂1300周年纪念。山下久夫与斋藤英喜的《叩问〈日本书纪〉1300年史》（思文阁出版，2020）能够让我们一览《日本书纪》从成书到近现代的接受史。

^① “汉意（からごころ）”是江户时代本居宣长等日本国学者的用语，用以指代和批判研读汉籍、醉心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倾向，宣扬所谓“大和心”，也即日本的古代精神。——译者注。

即便都用汉文，汉学知识所置身的社会语境根据时代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变化。泷川幸司《菅原道真——学者政治家的荣光与没落》（中央公论社，2019）关注道真作为“纪传道出身的官僚”^①这一侧面，明快地描绘出道真诗文背后当时的社会体制和政治动向。书中关于东亚其他地区具备儒学教养的人和平安时期的“儒家官僚”的比较也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本间洋一《王朝汉诗丛考》（和泉书院，2019）中收录的论文探讨前人对道真的诗的解释，提出新见解。其中，关于《菅家文草》诸作中可见“富于游戏心理的”的机智表达这一观点，对于思考当时的汉诗文在政治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富于启发。同一作者的《日本汉文学文薮：资料与考说》（和泉书院，2020）也收录了围绕江户时期的林家的论文。

由于僧侣是中世汉学的中坚力量，研究僧侣的具体交游、活动对于思考这个时代的汉学和诗文是不可或缺的。朝仓尚《禅林的文学——战乱中的禅林文艺》（清文堂出版，2020）探讨应仁之乱时期横川景三的动向和作品。横川躲避战乱在寄居之地与好友创作联句。正因为是在紧张的状况之下，与人交流所作的联句才备受喜爱，作者的这一观点应当也广泛适用于思考“战争状态下”乃至“紧急事态下”的文学。朝仓和《绝海中津研究——人与作品及其周边》（清文堂出版，2019）是一部浩瀚的著作，由绝海的传记研究、作品研究以及绝海相关的事迹研究构成，呈现了五山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在思考中世汉学教养的状况上，和汉联句这种文艺能够成为绝佳的材料。大谷雅夫《和汉联句的乐趣——芭蕉、素堂两吟歌仙以迄》（临川书店，2019）通过实例揭示应该如何解释、欣赏和汉联句。从中国中心主义的观点而言，和汉联句是一种和歌与不相容的汉诗句侏离鸩舌般混杂在一起的奇特文艺。但本书呈现的和汉联句的世界充满魅力。近年关于句题诗和和汉联句的研究表明，日本汉文学是在与中国不同的规则和评价标准体系中发展起来的。用与中国诗文相同的标尺来衡量日本的汉诗文，就好比将橄榄球和美式足球混为一谈，说它们都是使用椭圆形球的竞技。

《神皇正统记》虽然是掺杂假名的文献，但考虑到它对江户时期的儒者带来的影响，将其放到“日本汉学”这一节里面讨论也无妨吧。斋藤公太《“神国”的正统论——近世、近代对〈神皇正统记〉的接受》（ペリかん

^① “纪传道”是日本平安时代大学寮的四道（也即四个学科）之一，教授《史记》《汉书》《文选》等中国史书和诗文，是当时日本官吏录用考试中的重要科目。——译者注。

社, 2019), 论述近代以迄对《神皇正统记》的接受史。通过《正统记》接受史这一视点, 呈现江户中期“学知”的变化(原书称之为“考证主义”的“兴盛”), 很有意思。

“日本汉学”研究, 可以说必然要面对文化接受方的内在逻辑问题。丸井贵史《白话小说的时代——日本近世中期文学研究》(汲古书院, 2019) 根据对《今古奇观》诸版本的缜密调查, 指出都贺庭钟将白话小说视作“学问对象”, 在对“三言”和《今古奇观》作校勘的基础上撰写《英草纸》。将在本国不成其为“学问对象”的东西作为“学问对象”加以把握, 本书揭示出这一接受方的逻辑开拓出新的文学世界的事实。长尾直茂《本邦三国志演义接受诸相》(勉诚出版, 2019) 不仅论述《三国志演义》接受后的诸相, 还聚焦白话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日本被认知的过程。日本对白话小说的接受与黄檗文化的舶来也有深刻的关联。竹贯元胜《隐元与黄檗宗的历史》(法藏馆, 2020) 是今后黄檗研究的基础之作。

江户思想史研究领域, 通过有意识地与东亚其他地区进行比较, 自觉尝试梳理江户儒学特有的问题, 在这方面学界已有成果和积淀。中村春作《徂徕学的思想圈》(ぺりかん社, 2019) 是1980年代至2010年代著者有关荻生徂徕研究论文的结集。虽然在首刊论文的基础上做了大幅修订, 从本书可以看到展开上述尝试的优秀范例。片冈龙《16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朝鲜、日本、琉球“朱子学”迁移百态》(春风社, 2020) 运用生态学中的“迁移”概念作为“工作假说”, 尝试理解东亚各地区朱子学的展开。书中随处可见作者试图超越“一国思想史”的框架乃至“思想史”这一学科现状的抱负。另外, 板东洋介《从徂徕学派到国学——表达的人》(ぺりかん社, 2019) 并非采用东亚思想史的观点, 而是运用一种看似返祖的手法, 将荻生徂徕和贺茂真渊二人进行对比研究。但是, 本书看似细小的问题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却是巨大的。书中将徂徕和真渊的思想定位为不重“内心”只重“规范”的思想的两种类型, 从二者的对比提出对当下仍富于启发的见解。关于荻生徂徕, 荒井健、田口一郎还出版了译注《荻生徂徕全诗1》(平凡社东洋文库, 2020), 可见文学方面的研究也有所推进。

关于“规范”的研究, 这十年成果飞速累积的一个领域是日本《家礼》接受研究。2010年之后, 吾妻重二编著《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关西大学出版部) 陆续刊行, 2019年已刊至《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八》。松川雅信《儒教仪礼与近世日本社会——暗斋学派的〈家礼〉实践》(勉诚出

版，2020）分析浅见纲斋、蟹养斋、稻叶默庵等人围绕《家礼》的讨论与实践。文章指出，由于寺请制度等的限制，江户时期的儒者难以成为《家礼》这一“规范”的忠实践行者。但是他们找到了纳棺和下葬等“自由领域”，通过在这些领域遵守“规范”来巩固其作为具有儒学教养之人的自我意识。James McMullen 的《日本的孔子崇拜》（“哈佛东亚专著丛书”，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20）是作者释奠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有关怀德堂的研究，有清水光明《近世日本的政治改革与知识人——中井竹山与〈草茅危言〉》（东京大学出版会，2020）和藤居岳人《怀德堂儒学研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20）这两种著作刊行。前者详细探讨了堀田正顺、松平定信等为政者与竹山的关系，指出《草茅危言》是一册被宽政时期的政治状况严格框定的著作。另外，后者着眼于近世日本“儒者”的存在状况，同时以经学手法为主轴考察怀德堂学问的特质。积极介入政治、老于世故的兄长竹山和为人狷介、游离于朱子学的履轩，二人也是思考江户时期“儒者”之“家”的有趣素材。

对近代日本“汉学”的研究是目前发展显著的领域。2019年至2020年出版了《讲座：近代日本的汉学》全8卷（戎光祥出版），这个系列可以说将成为今后近代日本汉学研究的里程碑。野间文史解题，町泉寿郎与川边雄大解说版加藤虎之亮（1877~1958，号天渊）《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总说》（近代日本汉学资料丛书3，研文出版，2019）；町泉寿郎解题版本下彪（1902~1999，号周南）《国分青厓与明治大正昭和的汉诗界》（《近代日本汉学资料丛书》4，研文出版，2019）；武田祐树与町泉寿郎解题版川田刚（1830~1896，号甕江）《甕江文稿》（《近代日本汉籍影印丛书》2，研文出版，2020）等相关资料的刊行也有所推进。近年，“日本汉学”相关文献在中国影印出版的情况增多，2019年和2020年分别有陈广宏、侯荣川编《日本所编中国诗文选集汇刊》明代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卞东波、石立善主编《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刊行。影印出版虽无必要在意国界，但近代日本汉学方面的影印和资料出版还是很可靠的。

李セボン《追求“自由”的儒者——中村正直的理想与现实》（中央公论新社，2020）通过从内在解读中村正直（1832~1891，号敬宇）的思想，指出其思想体系处于儒学思考的延长线上，同时又能将西方思想和基督教毫无矛盾地统摄进来。

山村奖《近代日本与变化的阳明学》（法政大学出版社，2019）分析近代以后“阳明学”像魔咒般意义不断扩散，有时甚至带着反体制思想的魅力被人们接受的过程。本书结尾论述当代的“阳明学研究”和“近代日本的阳明学”的关系。近代日本汉学研究关系到对中国学研究史的理解。“近代日本汉学”乃至“日本汉学”研究并非寄居在中国学门下的门客，它作为一盏照亮中国学足迹的灯，也具有重要意义。

（高山大毅）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